

相忘于江湖

庄子与战国时代

张远山 著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一个作家可以不懂庄子，但如果没有庄子的那种心态和文化精神，恐怕就有基因缺陷。我对远山的文字也特别喜欢：干净，明快，内敛，非常有力量。

—— 韩少功（《马桥词典》、《山南水北》作者）

我几次读庄，积累下许多困惑，张远山的读法帮我解除了一些，还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思路。

—— 吴思（《潜规则》、《血酬定律》作者）

我对一本书的最好评价就是这本书像作者。书中纵横的气质、自以为是的气质、偏执的气质、楞头青的气质、三秒或四秒钟的绅士气质，都在张远山的身上清晰可见。

—— 毕飞宇（《玉米》、《推拿》作者）

远山先生的态度是严肃的，他是“准备半生，写作八年”，厚积薄发。因此，他的写作每一个字都经过心思长久的注视，都是心血之作。这部作品是一个异数。它既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哲学。这里有一个人的思想史，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一个人的知识学问。这部作品也恢复了汉语的尊严。

—— 余世存（《非常道》、《老子传》作者）

上架建议：历史小说

ISBN 978-7-5455-5313-0



9 787545 553130 >

定价：108.00 元



天喜文化公众号



天地出版社官方微信

庄子与战国时代

张远山 著

相忘于江湖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相忘于江湖: 庄子与战国时代 / 张远山著.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20.2
ISBN 978-7-5455-5313-0

I. ①相… II. ①张… III. ①庄周 (约前369—前286) —传记
IV. ①B2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245924号

XIANGWANG YU JIANGHU: ZHUANGZI YU ZHANGUO SHIDAI

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

出品人 陈小雨 杨政
作者 张远山
责任编辑 王业云 王子文 李栋
封面设计 桃子
责任印制 董建臣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北京市方庄芳群园3区3号 邮政编码: 100078)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电子邮箱 tianditg@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20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38.5
字 数 587千字
定 价 108.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5313-0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3207 (营销中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营销中心调换

余世存序

大年生存史观中的个人

远山先生的态度是严肃的，也是个人的。他不仓促草率，不是研读三年五年即宣布发现即推出产品，他是“准备半生，写作八年”，厚积薄发。因此，他的写作每一个字都经过心思长久的注视，都是心血之作。

这部作品是一个异数。它既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哲学。这里有一个人的思想史，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一个人的知识学问。这部作品也恢复了汉语的尊严。

若干年后看，张远山先生的《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①可能是当代汉语写作中的一件大事。但在今天，这部著作是以报摊图书的样式出现，而市场江湖的存在又非时髦、流行，因为它印着“纪念庄子逝世 2300 周年”的庄严广告^②。这几乎是庄子“材与不材”的散木象征，又是鲁迅的横站意象。

历史上有很多人格、精神、产品……被淹没的现象。陶渊明在其当时人眼里，只是二三流的诗人，《诗品》的作者把他列为中品；六七百年后，到了宋代，陶渊明才真正跻身一流诗人的序列。直到今天，墨子这样的思想家、冯梦龙这样的作家仍是被大大低估的人物。历史的接受之路并不平直，而是曲成万物。指望一个时代的主流知识界或市井文化给民族历史巨大的精神个体以公正的待遇，本身并不公正。因为这些精神个体之阔大多与民族集体意识的惰性、狭隘形成反差。

① 编者注：原文“《庄子传》”，为本书初版时主书名，现改为与本版一致的书名全称。下同，不另注。

② 编者注：指初版封面及其广告语。

对我们中国文化这样一个丰沛的存在而言，老子、庄子一类的道家学派人物的被低估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它反证中国文化在最近的两千年间为儒法等精神趣味绑架。中国精神至今未能走出秦汉之制的阴影，而超迈三代，将五六千年的文明史“清一”、“汇通”，催生出日新又新的文明。

出于对庄子的兴趣、发现，张远山花费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从事他的“庄子工程”。自2008年起，《庄子奥义》、《庄子复原本注译》先后问世，最近的成果，则是这部《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这样的工作本身即是当代社会的奇观。在当代社会流行成功流行小康等等的“镀金时代”，远山先生以一己之力，以自由作家之身，寂寞地为庄子作注、平反、作传，既是时代的奇观，也是我们汉语世界真正的安慰。

《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以编年史体和章回体来写历史和人物，逐年叙述战国史事和庄子生平。从中可见作者的功力之深厚，传统叙事在他笔下得心应手，而人物风貌亦旧亦新，跟我们相通。未来的研究者，将会比较这部作品跟司马迁人物纪传的关系，将会比较作者语言风格跟金庸小说风格的区别。

这部作品的创新显而易见。战国时代变迁与庄子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时代的风云与历史人物们的表现，新的变化与思想家们的应对，以及人物的悲欢离合的细节……栩栩如生。它还原了战国时代，使《易经》、《尚书》、《诗经》、《道德经》、《论语》、《春秋》、《国语》、《战国策》、《孟子》、《庄子》等经典文献鲜活起来，经典真正还原为历史叙事。

作品里叙写了不少人的丑陋、罪恶，也写了不少人的思考，读来令人拍案。由于秦国吞并巴蜀，有了粮草接济，东方战争的形态发生变化，不必春耕秋战，而能连年久战了。由于春秋以来的战争加剧，到战国动辄“斩首”上万，中国最优秀的思想家们在对人性的思考中不再停留在孔子“乱臣贼子”阶段，而开始质疑人性本身的善恶。而像匡章那样的人开始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后来为了保家卫国，一步步走入庙堂，前后判若两人，也成为当时人思考的对象，说明“庙堂争权夺利毫无底线，乃是逆淘汰的大染缸”……这些现象都为作者捕捉到，并写进了作品。

历史的发展当然重要，但在作者笔下，它已经更多地属于背景，真正烘托

的，是时代一流人物们的生活和思考。甚至儒墨的争竞也多属于背景，作者着力叙述的，是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人物们的生活和思考。在孟子的义利之辨外，在墨家巨子的变异之外，道家人物冷眼旁观世道人心，而活出了尊严。这个尊严，即是书中一再称赞的“真德”。在时代社会的热闹之外，作者高扬了人的尊严。

这种尊严，是还原，又是追认。即在春秋战国泥沙俱下中，在人命如草芥中，在处处有篡改、歪曲中，庄子们葆全了人性的真。在君臣父子快成为天经地义的罗网里，庄子们活出了自由，自适其适，活出了尊严。这一尊严在后来两千年大盗、乡愿合谋的中国生活中，尤其珍贵，它让我们看到，中国人求做奴隶而不得以及暂时做稳了奴隶位置的两种生存中，仍有第三种生存，有人性的真实美好。

这种尊严感，无疑更是对当下生活的态度。

显然，《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跟当下的戏说历史著作判然有别，也跟知识界的影射写作判然有别。戏说历史者在市井求利，影射写作者在主流求名。无论是证明儒教宪政主义，还是证明道家自由主义，都不过是挟自以为是的“知识正确”去裁剪先人著作。更不用说，那些借古人名头说事的历史小说、通俗历史，他们都以今人之心去轻薄古人。

远山先生的态度是严肃的，也是个人的。他不仓促草率，不是研读三年五年即宣布发现即推出产品，他是“准备半生，写作八年”，厚积薄发。因此，他的写作每一个字都经过心思长久的注视，都是心血之作。在写作上的严肃和尊严，当代人中，大概只有少数人可与之相提并论。

在分科分工的当代，这部作品是一个异数。它既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哲学。这里有一个人的思想史，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一个人的知识学问。这部作品也恢复了汉语的尊严。在理性主义的眼里，中国早期君主的重要讲稿《尚书》实在“诘屈聱牙”，记录历史的《春秋》不过是“断烂朝报”，即使群经之首的《易经》，也是要么晦涩，要么托命一如游戏……先秦在不少人眼里，既无古希腊人的理性，又无古罗马人的法治精神。至于高居庙堂的儒学伪道，即使当下占据知识界主流的学术，充斥市井的文艺，更是跟西方的理性、自由和个体本位大异其趣。但张远山的作品，则向我们表明，以庄子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在先

秦所抵达的成就足以证明，汉语自有风骨、理性和关怀。

如作者《后记》所说，庄子主张“至知忘知，自知无知”，“吾生有涯，知也无涯”，略同于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庄子主张“自适其适，以德为循”，反对“适人之适，役人之役”，略同于尼采的“不要跟随我，跟随你自己”。作者感叹：“隐于江湖的庄学真道，却与欧西古今大哲莫逆于心。”

从两千年来的儒学氛围中走出来并不容易，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开始，孔子被请回诸子行列。但对孔子和诸子的解读经历了反复。可见，我们民族要冲破大盗和乡愿的罗网，仍任重道远。两千年间，我们中国人一直活在伦理本位、儒家本位、王权本位、官吏本位的“差序格局”里，个人本位一直属于个案存在。甚至百年间的现代化转型，我们也是在儒家本位、革命本位、阶级本位等罗网中沉浮，这种迷失影响到我们的文史哲学思考，影响到我们官产学精英的存在状态。

我们今天知道，一个共同体的个体存在状态与其整体相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二者异质同构。是以中国人规模之巨，百年来千年来能称得上独立个体的人屈指可数。庄子说：“无知众人，因其无名无功而自卑，不敢因循内德，自适其适，而是迎合外境，适人之适，以便求取功名。适人而无技，必定无功无名，仍为无知众人。适人而有技，必有小功小名，于是成为小知。适人而有术，必有大功大名，于是成为大知。小知之学技，大知之学术，都是老聃所言‘为学者日益’，因而自矜其知，自矜功名，对下则自得而役人，对上则自卑而适人，仍是终身迎合外境而适人役人，不能尽其所受乎天，只能亏生、迫生，乃至受刑早夭。”将庄子这段话跟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做参照，可知大部分人抽离了现代化的真精神，即自由的、尊严的精神，即“真德”，而落入到各类现代说辞中去了。

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众多的汉语作品，都是求名求利的，少有明心见性之作，少有安慰、关怀和激励。《白鹿原》乃至莫言的作品只是半部杰作，它们多停在革命反思和故事本位中，尚未反思到个人本位；《拯救与逍遥》只是青春意气，它并未夯实人的价值。这类反思和意气，难以跟庄子们对匡章的同

情理解和批评相提并论。

张远山的工作是少数例外之一。如果我们知道，张远山、庄子等人的生存，在汉语里被称为“至知”，只不过是“道术为天下裂”前的自然状态，是现代性最为平实的自由精神；甚至儒生们称道的圣贤，也只是现代性最为健康的公民人格……我们大概能理解，两千年来、百年来我国的世道人心跟文明之间的距离，我们国人的生跟自由自尊人生的距离。两千年来，在人生中及格的国人学人屈指可数。

庄子、远山等人的努力正大，然而对这个积重难返的共同体来说，仍不足以撼动它固有的轨迹。这也是远山的“庄子工程”在当下被边缘化的原因之一。这样说，丝毫不减远山和庄子们的意义。事实上，在今天中国人迈向新生之旅中，远山们的工作已经成为火把、明灯，成为我们生存可信赖的营养和财富。

远山自承他的愿心是“颠覆秦火汉黜伪造的历史谎言”、“治疗庙堂伪道导致的民族内伤”、“接续江湖真道传承的先秦元气”……这是一种大时间观。市井文化多失去跟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通泰、美好。用庄子的语言，这是一种“小年生存史观”。但远山的工作是“大年”大时间观照下的个体安顿，这一工作如燃灯，如报春的燕子，是贞下起元的先声，他传达的是春天的消息，是元气淋漓的自由人生。

以此贺远山的《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问世！

作者简介：

余世存，1969年生，学者，作家，代表作《非常道》、《类人孩》、《老子传》、《大民小国》、《家世》等。

吴励生序

正本清源，天道绝对

我曾经在评论《庄子奥义》时直指出张氏（远山）之学术精神与章氏（炳麟）一脉相承，现在必须进一步指出其在“自坚其说”方面，比之章氏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无论是“发明真相”还是“自坚其说”，无论是庄学义理阐发还是张氏义理的进一步发扬，无论是“天道绝对”的终极建构还是“人间秩序”的终极解构，笔者均可负责任地说，张氏“新庄学工程”三书不仅集中国文史哲之大成，而且确实为中华学术发展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研究典范。换句话说，张氏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多得的大学者，更是当代中国“新庄学”研究之第一人，一如《齐物论》（张氏复原本第八章）中所说：“万世之后而一遇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坦率地说，张远山的“庄学三书”（《庄子奥义》、《庄子复原本注译》、《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①）一开始就抓住了中国哲学的制高点，这个制高点就是“天道绝对”。许多学者谈论西方的“逻各斯”传统和中国的“道论”传统时，却不能意识西方的逻各斯传统在不同时期造就了无数的大师级人物，而中国的“道论”传统其实却在不断地萎缩，直至最后只能感叹“一代不如一代”。

若论根本原因，恐怕就是“道术将为天下裂”。问题在于，“道术将为天下裂”究竟是“哲学的突破”还是“思想的倒退”呢？这在当下中国学界其实纠结重重：一方面我们不断欢呼先秦“百家争鸣”的思想局面，另一方面又要继续去论证

^① 编者注：原文“《庄子传》”，为本书初版时主书名，现改为与本版一致的书名全称。下同，不另注。

“三代之治”尤其是西周的“公天下”的合理性。后者如果真的那么合理，所谓“政教合一”的王官之学乃至当下的体制化学术，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如果是前者确实值得欢呼，就像许多学者或根据雅斯贝尔斯或帕森斯或韦伯等所论证的那样，那是思想轴心时代所出现的一场精神觉醒运动，这才是后辈学者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我想同意后者的应该占多数。

然而，不管是“道术将为天下裂”抑或“哲学的突破”，均关系到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发展的根本。因此何为“真道”，就不仅仍是困惑中国学界的问题，而且是个需要不断重思的问题。估计张远山一开始也便是由于困惑，之后为了正本清源，张氏之决绝，上下求索之壁立千仞，迥异于当下诸多学人的浅尝辄止而又喋喋不休。当然，即便张氏本人，对“天道绝对”的认知，也不是一步到位，而是移步换形，并步步为营，从《庄子奥义》到《庄子复原本注译》（三册）循序渐进，直至眼下的《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上下册）出版，其“无待之待”的“遥达”终臻完备。

1

在《庄子奥义》里，张氏对“逍遥游”的“逍遥”二字的解释，基本还是出于“自由”的认知：心灵的自由，基于对“道”的体悟；身体的自由，则是对“道”的顺从。并指出（庄子）“逍遥”对（老子）“无为”的重大突破，就是“无待”（蕴涵“无蔽”）。这一点跟晚清以降学者乃至当代陈鼓应对“逍遥”的理解距离其实不远，后者甚至干脆以为：“《逍遥游》提供了一个心灵世界——一个广阔无边的心灵世界；提供了一个辽阔无比的精神空间。”（《老庄新论》）也即“精神”由大解放而得到大自由。特别醒目的倒是，张远山一开始即突出强调了“道”的至高地位，而这又是他跟所有解庄者逐渐拉开距离的最突出标志。这很重要，其意味着并非仅为精神自由，更是一种精神实体。另外需要特别指出，对所有解庄者所据郭象版庄子的谬解之断然拒斥，是熟悉张氏“新庄学”的人都一目了然的（比如说这可能跟他最早阅读流行的郭象版“庄子”对其精神的扭曲和

智慧的侮辱有关，也可能跟现世实存的秩序与内在的生存感受密切相关)，但是，能够真正把握到他的理论内发动力即由此生发，并确实意识到由此产生的颠覆力量和勇气，可能需要对他“新庄学工程”的深入解读方能领会得到。如：“‘逍遥’是庄学核心名相，因此冠名‘内七篇’之首。郭象谬解‘逍遥’为‘自得’，‘自得’谬说贯穿郭注始终。唐人成玄英以降，治庄者喋喋不休地蹈袭‘自得’谬说，连局部驳斥郭象者也无例外。然而庄子从未说过‘自得’，而是一再重言‘不自得’。”因为得（德）乃“道”所分施，所以“至德不德”，等等。

假如说《庄子奥义》奠定了张氏“新庄学”义理的基础和框架，《庄子复原本注译》则对“新庄学”义理做详尽而全面的阐释和进一步拓深。尤为重要的是，“天道绝对”的理念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并逐步体现在复原注译的每一篇的“题解”和“附录”之中。仍以“逍遥游”解读为例，在复原本里其甚至开宗明义：“‘道’训消隐，意为自‘道’己德。‘德’为‘道’施，故宜永葆。‘德’低于‘道’，不可自矜，不可外荡外显，而当自‘道’。……‘遥’，训趋赴，意为‘遥’达彼道。‘遥’达彼道，信仰天道，以客观天道为宇宙至高存在，永不自矜尽知天道。天道只能不断趋近，不能终极达致，因为‘无极之外复无极’。”这样，把“逍遥”解释为“自由”就被进一步解释为对“天道绝对”的认知，不仅如此，他甚至把严复当年还有点朦胧的意识（“一切世间所可言者，止于对待。若真宰，则绝对者也”）明晰化乃至体系化了。颇有意味的是，历来以为庄子哲学具有解构性特征——比如陈鼓应以为“逍遥游”还有重估价值的意义，其明显受到尼采观念的影响；庞朴则说：儒家理论都是建构性的，而道家的观点都是解构性的。儒家想尽一切办法来进行建构，而道家却一个劲儿地消解儒家构筑的东西（《中国文化十一讲》）——在张氏力图体系化的重新解释当中，倒具有相当程度的建构性了。

这实在是种理论倒转，而且这种倒转的气魄表面上看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其精神内核和理论深层却是为了把“天道绝对”彻底地彰显出来。甚至还不完全是理论勇气的问题，更是学术功力能否胜任的问题。假如我们对当年章太炎与胡适关于治经治子之间的纠结争论还有印象，一定记得章氏的治经治子经过校勘训诂这一最初门径后必须各有所主的主张，所谓治经乃“客观之学”治

子是“主观之学”，后者讲求的是“自坚其说”云云。我曾经在评论《庄子奥义》时直指出张氏（远山）之学术精神与章氏（炳麟）一脉相承，现在必须进一步指出其在“自坚其说”方面，比之章氏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诸如“庄学四境”（无知、小知、大知、至知——对“道”的体悟之有无和程度）、“庄学三义”（顺应天道、因循内德、因应外境）、“道术九阶”（外天下一外物—外生—朝彻—见独—无古今—入于不死不生—撻宁—撻而后成）、“庄学至人”（践履三义、抵达至境、成道九阶）等等，其间术语、概念、范畴均来自张氏的全新创作。这种创作肯定不是为了创作而创作，而是通过对庄子文本的细读归纳出来的，最典型的是《庄子奥义》中“余论一”所展示的“庄学奥义的全息结构”，不仅可以让人领会到文本细读的功夫，而且其归纳之全面之细致确实让人叹为观止。如他为了归纳的方便，甚至绘制出十几张图表：除了“内七篇”的篇名结构表和单篇结构表之外，“庄学四境的动植象征系统”、“庄学四境的排行隐喻系统”、“‘内七篇’角色四境表”、“寓言六式（除了‘内七篇’寓言表，六式是：‘结构一：四境俱全的完整式。5例’、‘结构二：专明一境的特别式。7例’、‘结构三：基本式、完整式减去无知。15例’、‘变式一，基本式减去小知。11例’、‘变式二，基本式减去大知。5例’、‘变式三，基本式减去至知’）”等，最后干脆把“内七篇”庄学义理用一幅“南溟吊诡图”做立体展示。而所有这些图示和展示，并非毫无根据的猜想，最有力的根据就是庄门弟子为“内七篇”所撰的一篇序（《杂篇·寓言》）和一篇跋（《杂篇·天下》）。

“寓言”篇中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钧。”“天下”篇中说：“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蔓延，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张氏的重新解释以及相关图表制作便是以此为根据，并由此出发也由此复归的。也就是说，“新庄学”的重新解释，首先必须彻底面对的是“庄学三言”，张氏概括的是其既对庄学之敌构成“拼图障碍”，同时又为“庄学之友”所设的“拼图提示”，他说：“晦藏其旨的寓言，暗示支离其言的卮言之奥义。支离其言的卮言，点破晦藏其旨的寓言之奥义。变文转辞的重言，确证卮言的支离之义，确证寓言的晦藏之旨。”张氏在“庄学三言”的破解上所花的巨大心力，历代解庄者确实少有人能比。与此同时，为了颠覆“郭

（象）注成（玄英）疏”千百年来形成的“旧庄学”话语的重重障蔽，也即把被“郭注成疏”完全颠倒了的庄学真貌与话语真相重新颠倒过来，更是特别严峻考验了张氏的校勘训诂的传统国学功夫和功力，而《庄子复原本注译》三册，便集中体现了张氏这种国人荒疏已久而他居然驾轻就熟的功夫与能力。

现在可以顺便回答我写《庄子奥义》评论时一些朋友提出的对张氏的两个疑问。一是如何证明庄子本人所作只有“内七篇”呢，二是张氏其实延续的仍是“古史辨”遗绪。要说张氏有“疑经谤圣”的“嫌疑”，其实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自晚清今文学家提出了‘新学伪经’的说法以后，许多古书像《左传》、《周礼》甚至于《史记》、《汉书》都有了刘歆作伪和窜入的嫌疑……”（《顾颉刚经典文存》），在发明真相方面，张氏似乎确实形似，比如他自己也说，“古史辨”把《列子》伪书“捉拿归案”，他把郭象版《庄子》作伪“捉拿归案”等等。然而，张氏并没有像顾颉刚那样刻意强调史学的时代性问题，比如不同年代和时期的孔子形象等，更多强调的只是“层累的造伪”问题，其不但反对用治经的方法治子，而且治史的方法也是用来进一步完善其“自坚其说”。因此他的治学风格乃至行文风格，确实酷似章太炎及其弟子（比如周氏兄弟，我不知余世存先生说其行文风格跟金庸也有联系根据何在，请参见《大年生存史观的个人——读张远山〈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清峻通脱，说理透彻，乃至壁立千仞的学术精神。至于庄子本人著作仅有“内七篇”，晚清以降所分歧者大多是对庄学义理的解释，对“内七篇”本身似乎争论不多（用张氏说法则是：“内七篇”之外，士大夫们既不熟悉也不重视），即便流行一时的当代道家研究专家陈鼓应，在《老庄新论》中所解读的庄子也一样是“内七篇”，当年章太炎的《齐物论释》甚至特别突出的还只是庄子所作“内七篇”中之一篇。张氏之重视庄学义理已无须强调，颇有意味的是，他指出：“旧庄学倾力考订讹误，短订训诂个别字词，目的仅仅是加固儒学曲说，强化郭象义理，无不越考证越糊涂，越训诂越遮蔽。歧义纷出的旧庄学，添乱作用大于学术价值，把庄学越埋越深，使阅读越来越难”，即便值得一提的民国学人刘文典和台湾学人王叔岷两位考订大家，他们的考订以及解释也不能使张氏满意，理由就是“颇具儒学成心，因此文字考订疏漏尚多”、“均不明庄学真义”等，闻一多、关锋、陈鼓应的考订情形道理相同，“根本原因是没想

到郭象竟敢篡改《庄子》”——然而，为了彰显庄学真貌和真义，张氏甚至进入更大范围的校勘训诂，不用说《庄子复原本注译》的版本考订即已完全回答了有朋友关于“内七篇”的疑问，比如张氏在该著序言一开始就说：“庄子所撰‘内七篇’，仅有庄歿以前史实，无一庄歿以后史实。弟子蔺且、再传弟子魏牟等撰‘外篇二十二’多有庄歿以后事实，无一魏歿以后史实。”而新近出版的《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更是以编年史的方式，进一步坐实了种种论证。

这就涉及整个浩大的张氏“新庄学工程”。在《庄子奥义》的绪论（二）中，张氏即已指出：“若不恢复原文并纠正错误断句，就难以用不合‘内七篇’义理来驳诘其曲解。但要纠正一处篡改或误断，牵涉极繁，论证更难。即有知者，面对积非成是、积重难返的权威谬见，也视为畏途。”事实的确如此，光是《庄子复原本注译》的巨大工程，不知得让当下多少英雄气短？！因为难度，也因为广度和深度，很难全面呈现张氏考订的精准独到的学术风采，这里仅举其对郭象版、魏牟版和刘安版庄子本的异同考订校勘为例，也暂且不论其考证结果的石破天惊，如“成书于西晋的郭象版删改本，是今日唯一的《庄子》传本。本书复原的早于郭象版的两种庄子版本：成书于战国的魏牟版初始本，此前无人知其存在；成书于西汉的刘安版大全本，此前无人确知编纂者”，就说他的版本考证的“泰山不移”。

庄子再传弟子魏牟是重中之重，除了排比史料，考辨正误，梳理魏牟生平之外（《庄子复原本注译》绪论一），魏牟版《庄子》张氏的史料根据是：“魏牟以后的战国末年，钞引《庄子》初始本最多的是《荀子》、《韩非子》、《吕览》。刘安以前的西汉初年，钞引《庄子》初始本最多的是贾谊二赋、《韩诗外传》。先秦三子、汉初二子钞引之例，是考定《庄子》初始本之成书时间及篇目构成的基本依据。”之后他例举先秦三子和汉初二子的各自文本，与《庄子》初始文本的若干思想比照分析，或明斥（荀子）、隐斥（韩非）或明钞、暗引、化用（吕不韦等以及贾谊、韩婴）的史实，以及庄前史实和庄后史实、魏前史实和魏后史实等等，“通过综合考量所涉不同史实、著录庄事庄言、文本结构差异、有无寓言卮言、有无动植物、仿拟内篇水准、偏离内篇义理等等各项（详见各篇校注）……”，得出“外篇二十二”可分三组的结论，第一组五篇：《寓言》、《山木》、《达生》、《至乐》、《曹商》，当属弟子蔺且所撰；第二组十三篇：《秋水》、《田子

方》、《知北游》、《庚桑楚》、《徐无鬼》、《管仲》、《则阳》、《外物》、《让王》、《盗跖》、《列御寇》、《天下》、《惠施》，当属再传弟子魏牟所撰；第三组四篇：《宇泰定》、《肱箠》、《天地》、《天运》，当属其他弟子、再传弟子所撰。

魏牟版初始本《庄子》确实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之后的刘安版大本本篇目考，就为郭象版的删改本《庄子》找到了直接证据。“刘安版《庄子》大本本，全部保留魏牟版《庄子》初始本。对于魏牟版‘内篇七’，不增不减。对于魏牟版‘外篇二十二’，则增补慕庄后学所撰、符合刘安特殊政治意图的六篇《骈拇》、《马蹄》、《刻意》、《缮性》、《在宥》、《天道》，变成刘安版‘外篇二十八’。又创设魏牟版没有的‘杂篇’，收入慕庄后学所撰《说剑》、《渔父》等十四篇，新增刘安版‘杂篇十四’。”由于刘安的特殊政治身份，张氏破除历史迷雾，去除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障蔽，如“稍后于刘安的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曰：‘庄子著书十余万言。’稍后于司马迁的刘向《别录》、刘歆《七略》曰：‘《庄子》五十二篇，宋之蒙人。’司马迁、刘向父子均曾寓目刘安编纂的《庄子》大本本、刘安撰著《淮南子》，未必不知《庄子》五十二篇之‘解说三’又见《淮南子外篇》，未必不知‘解说三’必为刘安所撰。或许因为刘安被汉武帝诬以谋反而自杀，导致刘安编纂《庄子》大本本成了不宜提及的政治禁忌，因此司马迁才不得不含糊其辞曰‘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刘向父子才不得不含糊其辞曰‘《庄子》五十二篇，宋之蒙人（庄周撰著）。’”而相关话语障蔽一得破解，“内外杂”篇划分始于何时何人（西汉刘向？东汉班固？魏晋司马彪？西晋郭象？西汉淮南王？！）的问题也就得到有力的回答。张氏的考订之细密，论证之详尽，还可参阅其《余论：〈庄子〉佚文概览》以及附录六篇中的分类参照表，当然最重要的体现还是具体的复原本（魏牟版初始本和刘安版新增外篇六篇和杂篇十四篇以及“解说”三篇）在中国“庄学研究史”基础上的“校注”（包括校勘）、“辨析”和“今译”，尤其是每篇的“题解”以及“附论”，鞭辟入里而又提纲挈领，真的不由你不击节。

也许就像庞朴所说的那样，用汉学的方法来解决宋学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音韵、训诂、文字等考据方法，来分析典籍文献，进而为研究心性、天道、政治、经济等义理内容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不同者，即如上述指出的“客观之学”之发明真相与“主观之学”之自坚其说，庞朴厚积薄发所从事的基本

是前者，张氏厚积厚发所坚持的则是后者，当代中国有此学术功夫者仅寥寥数人矣！

2

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张氏义理阐释的体系性倒转的“自坚其说”问题。也许需要重新强调张氏解读庄子的一对关键词：庙堂与江湖。其既可能出于庄子本人对生存秩序的最高理想，也可能出于庄子哲学在中华 2132 年的君主专制史里的变相流传以及“庙堂话语”的重重覆盖，张氏由此给了自己比“古史辨”更为艰巨的任务：还庄子话语真相和庄子精神的本来面目，并对庄子义理做出重新解释。这里无需重复张氏关于庄子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四百年间的流布篡改以及唐宋以降治庄后儒们的层累造伪的考察，乃至被神仙家们拼凑加工《列子》、歪曲利用《老子》、《庄子》成为专制庙堂服务的工具的过程，而单就“庄学四境”的重新发明，即已完全颠覆了郭象义理，笔者关心的是：“庄学四境”的建构与解构，张氏究竟如何通过“周而复始”而又能够“螺旋式”上升的？

首先必须承认，张氏庄子解读的“庄学四境”创造性空前。尤其是他提出（庄子）在远离“造化初境”之后，“文化”分为“顺道文化”和“悖道文化”两部分，并进而解释对顺道文化的哲学建构（无知↗小知↗大知↗至知）和悖道文化的哲学解构（无知↘小知↘大知↗无知），他说：“庄子常常在建构某一名相的顺道文化之时，也同时解构这一名相的悖道文化，而且通常侧重解构，偶尔侧重建构，建构之后也必立刻解构。如《逍遥游》初述‘大知’寓言是建构，重述时以‘无极之外复无极’解构，所以主角必须同为鲲鹏，内容也基本相同；而‘小知’寓言都是解构，初述、重述的主角无须相同……”有关道家思想的“至知 / 无知”的终极表达式，更是其独具慧眼的发现：“‘内七篇’从未在某个局部清晰完整地使用过终极表达式，而是把终极表达式的前件‘至知’和后件‘无知’，支离分开在上下文甚至前后篇……只有透彻理解庄学四境，尤其是透彻理解庄学至境，再联系上下文乃至前后篇，方能知其晦藏，窥其奥义，否则就会被局部字